

佛经文献与古代中外文化交流

孟雪梅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佛经文献是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 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发展中占有独特的位置,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佛经翻译对古代中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与传承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内容; 对佛经文献的需求推动了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 通过中外僧侣往来和各种途径, 使佛教文献大量流向海外, 对我国与各国、各民族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佛经文献经历代抄录刊刻, 数量庞大, 种类繁多, 它为研究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演化、文献的版本和目录的类型提供了佐证, 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 佛经文献与印刷术的发明与传播有着密切关系, 由于对佛经的大量需求的驱动而发明了印刷术, 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使佛经文献与印刷术技术一起向海外流传。

关键词: 佛经文献; 文化交流; 图书事业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6)01-0065-04

中国佛教源自印度, 是亚洲各国人民共同信仰的主要宗教之一, 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佛经文献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占有独特的位置, 它是我国光彩夺目的历史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由于佛教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已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密切结合, 影响日隆, 佛经数量也随之增多, 对古代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与传承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佛经翻译与中外各民族文化的融合

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后, 形成北传汉语系的佛教和藏语系的佛教。佛经翻译是佛教传播的基础工作, 是古代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它的开展加强了中外各民族文化的融合。

1、佛经翻译揭开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章。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 安息国太子安清, 字世高此年到洛阳, 他在中土二十多年里共译佛经三十五部, 四十一卷, 他也是史载第一位译经外僧。汉明帝永平十一年(68)所建白马寺是封建社会官造的第一座佛寺, 也是传教译经之所。早期的佛经翻译主要依靠西域来华僧人, 如迦叶摩腾、竺法兰、支类迦讫等均是著名的佛经翻译家。

佛经翻译事业在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兴盛局面。汉末三国时许多西域僧人东来, 翻译人数增加。到洛阳的名僧有天竺的县柯迦罗, 吴国的译经事业也十分兴盛, 大月氏人支谦就是当时著名的译经大师, 此外还有名僧康僧会。三国时翻译的佛经据《开元释教录》载共二百零一部、四百三十五卷。西晋时, 译出的各种经、律、集、传达三百三十三部, 其中著名的译经大师是竺法护。到十六国东晋时, 译经事业发生了变化, 从私人译经发展到政府支持的译经场, 促使佛经数量剧增, 佛教典籍收藏也集中到寺院, 寺院既是译经之地, 也是传经之所。当时最著名的、译经最多的是道安、鸠摩罗什。道安作序并注释的佛经二十二卷,

而鸠摩罗什在长安的译经道场有上千人, 经十年译出佛经七十四部, 三百八十四卷。^[7]他们的译经活动, 丰富了佛教典籍, 并对后来的佛教文学产生了影响。据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所载, 到南北朝末, 一共有译经一九一三部, 四五七五卷。

魏晋南北朝时期, 印巴次大陆等地来中国从事佛经翻译的僧徒有七十多人, 他们的活动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传播, 丰富了中国图书的内容。当时, 除了西僧东来外, 也有中国僧徒西行取经的。史传记载的有八十九人, 法显就是其中杰出代表。

隋、唐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 译经事业也发展到顶峰, 其译经特点是规模庞大, 由译场组织变成了翻译馆。在隋代, 佛教典籍日增, 据释法琳《辨正论》说: “自开皇之初, 终于仁寿之末”, “凡写经四十六藏, 十三万二千八十有六卷。”炀帝早在平陈之后, 即“于扬州装补故经”、“合六百一十二藏”, “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由此可见译经的数量是空前的。^[2]

唐代, 佛经翻译和整理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玄奘法师的译经事业。他游学印度十七年, 是法相宗在中国的创始人, 一生中共译出佛教经、律、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7]所译佛经的质量和数量都是最高的。玄奘以后无人望其项背。

在宋代, 宋太宗也致力于翻译佛经, 建立了译经院和印经院, 普及佛教经典。据南宋诗人范成大的旅行记《吴船录》所收《西域行程》记载, 公元964年, 宋廷“诏沙门三百人, 入天竺, 求舍利及贝多叶书。”这些记载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印之间文化交流的频繁。^[4]佛经翻译工作辽、夏、金也均开展过, 但以元代最为活跃, 翻译汉文书籍中佛经较多, 必兰纳识里还曾运用各种文字译经, 因此元代佛经译书种类、数量众多、盛极一时。历朝的佛经翻译极大地促进了

收稿日期: 2005-04-19

作者简介: 孟雪梅(1961—), 女,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信息管理系教授, 在读博士。专业方向: 书史与图书馆史。

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佛经翻译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由于佛教流传范围广,中印佛教文化交流频繁,我国各民族地区均受其影响,故而竞相翻译佛经,极大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如桑耶寺的佛经翻译就很有代表性。公元7~8世纪,在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和东亚的中国有三大佛教道场甚为引人注目,这就是中天竺摩竭陀国的那烂陀寺(Nalanda),唐朝都城长安的大慈恩寺,吐蕃山南地区的桑耶寺(bsam yas)。桑耶寺位于今西藏扎囊县境内的雅鲁藏布江北岸,它可算是西藏寺庙之祖,是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宝齐全的寺院。在历史时期,该寺因设有固定的译场,将大量的梵、汉文佛经翻译成藏文,而且藏族佛经史上有名的所谓“七试人”就出家于此寺,所以享誉藏区。赤松德赞赞普曾派人到印度去迎请高僧大德到吐蕃弘扬佛法,并派出一批人到印度去留学。这两项措施都和翻译佛经、传授印度佛法有直接的关系。

依布顿大师的《佛教史大宝藏论》得知,从印度请来的高僧有无垢友、佛密、寂藏、清静狮子等人。当时,在桑耶寺内设有专门的译经场,从事梵文和汉文佛教经典的翻译。据《拔协》记载,大译师耶喜旺保主要担任印度文佛经的翻译,而以克什米尔的阿难陀和甲·梅果为助手。其中,翻译的印度佛经有《根本四部》、《四阿含》、《二十根本教诫》、《譬喻部》、《阿毗达磨之声闻俱舍》等。^[4]在此之前,印度的大乘经典大量藏在那烂陀寺内,但那烂陀寺遭受火灾的洗劫之后,许多经典化为乌有。所幸这些经典在汉地早有译本流传,赤松德赞赞普便组织起300人的翻译队伍,邀集藏、印、汉三方高僧力量,由赞普供给生活费用,由王妃降秋杰亲自主持法台,管理僧团事务,举行大规模的汉文佛经翻译。这对佛经文化的保存起了巨大作用,为以后从汉、藏文佛经入手,恢复已失传的梵文佛经奠定了基础。汉、藏、印多方僧人云集桑耶寺译经场,互相切磋,互为补充,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据说,824年在丹噶尔宫由吐蕃众译师将所译经典的名字、卷帙、偈颂数目等编写成目录取名为《丹噶尔目录》(ldan-dkardkar-chag)这是现存的吐蕃译经史上的第一部目录。此目录收在藏文大藏经《丹珠尔》内,共收经论达700余种,其中有34种经书是自汉文译成藏文的。^[4]

二、佛经文献与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

佛教的东渐和南传,客观上对我国与各国、各民族佛教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它也开启了中外图书文化交往的大门,推动了古代中外官府和民间的友好往来。佛经文献东传的主要国家是朝鲜和日本,南传主要是越南。

1、佛经文献在中朝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中国汉语系佛教在公元4世纪传到朝鲜,隋唐时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文化交流十分密切,1966年在朝鲜发现的刊刻在八世纪初的汉译《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就证明了这一点。^[15]自公元918年高丽王朝建立后,朝鲜与当时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友好往来与交流进一步发展。佛教文献交流是中朝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据文献记载,高丽“国人好佛法”,仅京城“开城府有寺七十余区”。宋初高丽僧人义通

“来游中国”,开宝元年(968)到明州(今浙江宁波)。众多高丽僧人渡海入宋的目的是求法、求佛典,或游拜圣迹,形成了当时佛教交流的一大特色,即高丽人通过在宋搜集、购买佛教经典并传送回高丽,以满足高丽佛教发展和佛学研究的需求。

中国古代佛教典籍的外传促进了高丽的佛教文化发展。在宋开宝四年(971),在成都开雕印刷《大藏经》(又称《开宝藏》、《蜀藏》,共五千零四十八卷^[7]),历经13年告成,高丽人闻讯而两次遣使求宋廷赐予《大藏经》,使雕版印本《大藏经》首传高丽。此后高丽又多次向宋遣使求赐《大藏经》,据史书记载,高丽向宋求得《大藏经》共7部,^[6]并依宋《开宝藏》复刻高丽《大藏经》,共5924卷,^[15]使高丽佛教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

高丽僧人义天在中国和高丽佛教文化交流中贡献较大,他入宋求法多年,回国后对佛经进行了整理。由于中国唐以前佛经遭受战乱多已亡佚,但在高丽仍保存不少隋唐时期传入的佛籍,随着义天入宋,使不少佚经又重返中土,对我国古代佛教典籍保藏意义重大。^[6]到元代,高丽到中国的求法僧人数量剧增,更广泛地促进了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1290年,元朝派遣工匠去朝鲜修补海印寺所藏经版。1308年,朝鲜以新版《高丽藏》进献元庭,1314年又将另一部赠送蒙古。1312年,高丽王向元帝致敬,下令印制五十部《高丽藏》分送各寺院。1314年,高丽从中国购置了一万卷书籍,元朝又加赠藏书4千卷,这一切交流活动,都和佛教有着密切关系。^[15]

2、佛经文献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汉语系佛教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对日本的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过极为重大的影响。在进入13世纪镰仓时代之后形成许多带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这些佛教宗派中,净土宗、真宗、日莲宗就是日本僧人依据并发挥汉译佛经和中国佛教著述新成立的宗派。日本众多佛教宗派所用的主要经典是汉译佛经和中国人的佛教著作,它们所奉的教祖、祖庭也可以追溯到中国,中国古代出版的“大藏经”至今在日本仍有收藏。历史上为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人很多,中国高僧鉴真、道隆、正念、祖元、一宁、隐元等,均携佛经文献赴日传教,而到中国的日本的求法高僧最澄、空海、圆仁、圆珍、荣西、道元等,^[1]每返日本均带大量佛经。如在630-834年间,日本共派遣唐使团15次,许多高僧赴唐学习并留唐多年,中日文化交往密切,佛教传播是其中重要内容。五代后周时,杭州雕印的佛经《宝篋印心咒经》84000尺已经传入日本。据文献记载,吴越国人了解到天台宗的佛经多有失缺,而在日本却有保留,还托吴越商人带去黄金500两到日本补购。^[3]983年,宋太宗还以《开宝藏》佛经一部赐给日本僧人。^[15]这些都证明,佛经文献不仅在当时中日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促进了中日人民的友好往来,还推动了日本的印书事业。

此外,佛教还南传至越南,早期的越南版中国书籍中,佛经占有较大比例。越南虽然从未印过全套佛藏,但印了不少佛教著作,至今河内还保存1652-1924年间出版的佛经400种以上,其中,有20种为越南人著。^[15]由此可见,中国佛教文化对朝鲜、日本、越南的文化发展均产生深远影响和促进作用。

三、佛经文献与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

佛教的传入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深远,它被历代统治者视作维护封建秩序的思想武器而加以保护。因此,佛经文献历代皆有,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在历史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为研究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演化和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佐证,丰富了古代文献版本目录的类型,促进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

1、丰富了图书版本和类型。佛经的写印方式主要有写、印两种。因而产生了写本和印本两类。在雕版印刷术产生前的漫长岁月中,佛经流传主要靠写本。写本中最多的为墨书,书写形式有横行、竖行两种,此外还有朱书、色书等,有些佛经中带有彩绘插图。从图书发展史来看,汉至唐佛经写本较多,但流传下来很少,多在敦煌遗书之中。唐至宋、辽、夏代,写经数量多,流传下来也多,如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辽代三件写经,西夏时的《光明最胜王》等。自宋以后,几不见佛经写本,而刻本日增。

佛经印本主要有私刻、坊刻、官刻,而唐代佛经多为民间的私刻和坊刻。如1944年成都唐墓出土成都卞家刻印的《陀罗尼经咒》、西川过家所雕《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及浙江龙泉塔中发现的卷本《妙法莲华经》等。五代以后,官刻本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私刻的五代刻本,宋刻本、金刻本、明刻本仍为数不少。其中,金代山西民间集资兴刻的《大藏经》(又称《金藏》、《赵城藏》,七千一百八十二卷)^[14]较为有名。这一时期刻印地区主要在浙、闽、蜀等地。

官刻佛经是五代以后出现的,它在数量和质量上要优于私刻。特别是南北两宋时期,我国雕版^{印刷}处于黄金时代,官刻释经较多,当时释经在各地开雕,而印刷则统一在京师进行,宋开宝四年雕刻了佛教总集《开宝藏》,受其影响,辽刊刻了《契丹藏》(又称《辽藏》)。在明代,官刻佛经专门由司礼监统属的经厂和番经厂负责,所刻佛经称为经厂本。

由于官、私、坊均刊刻佛经文献,而且遍布各民族、各地区,使我国古代佛经文献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而且装帧形式多样,有卷轴装、经折装、册页装、线装等。书写材料多为纸绢,许多佛经都为孤本、秘本、珍本、善本,具有极高的收藏和使用价值。

2、完善了目录体制。佛经目录是我国目录学史上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灿烂夺目的瑰宝。它不仅对研究我国各朝各代佛教事业发展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完善目录体制、丰富目录类型、研究目录体制的发展、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的佛经目录编制最早始于晋代。那时,由于佛经增加,佛经目录一时繁荣。仅三百多年间,有史可查者就达三十多部。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经目录编制的发展阶段。我国第一部佛经目录是晋代名僧道安编辑的《综理众经目录》,该目录是对当时中国佛教书的一次总结。

梁朝天监年间,又有三部讲经目录书问世,即僧绍的《华林藏众经目录》、宝唱的《众经目录》及僧佑的《出三藏记集》。其中以《出三藏记集》最为有名。该书在收录范围、书目方法、分类体系上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目录学思想上也形成了一定体系,对当时的目录学家影响巨大,特别是梁武帝时期的阮孝

绪,在其所编的《七志》中第一次正式给佛经设立了部类“佛法录”,收佛典五千四百卷,成为综合目录七分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与汉籍文献平等的位置。六朝时的佛经目录数目远较同时期汉文正史目录、官私藏书目录多得多。由于佛教影响日深,使图书目录类型增加,体例也发生了变化,从而使目录学进入一个转折变化的历史时期。

隋唐两代是佛经目录编制的繁荣时期。印度、尼泊尔等地的佛教目录对此时的目录学影响较大。隋代佛经目录大量问世,其中《大隋众经目录》、《历代三宝记》、《隋仁寿年内典录》、《林邑所得昆仑书诸经目录》、《众经目录》等较为有名。唐代佛经目录众多,初期的代表作是《大唐内典录》。但价值较高,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开元释教录》。此外,《开元内外经录》、《众经目录》、《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等也较为有名。这些目录为研究隋唐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发展提供了依据,也丰富了目录学的内容和类型。

自宋以后,佛经目录的编制日渐衰落,这时期的佛经目录虽多,但影响远不及隋唐之盛。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元代《至元法宝勘同总录》。^[2]

总之,佛经目录的出现,使我国的目录类型多种多样,目录体制也日趋完善。

3、加快了书籍制度的演化。我国古代书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简策制、卷轴制、册叶制。而卷轴制向册叶制的转化是一个重要的阶段。这种转化就是受佛经文献的启发。也可以说,佛经文献在卷轴制向册叶制转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是中外书籍形制的融合和发展。

众所周知,卷子书长且舒卷费事、费时。自西晋以来,有时只需念其中一部分,这样卷子书则十分不便。到了唐代,接受了印度贝叶经形式的启示,将经卷改为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此后演化为旋风装,从而进一步产生了册叶制度的最早形式蝴蝶装。

由此可见,书籍制度由旧形式向新形式的发展过渡中,佛经文献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佛经文献与印刷术的发明与传播

1、佛经文献的需求驱动了印刷术的发明。在我国唐朝,经过武后和宪宗的提倡,举国上下对佛教的信奉几乎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宗教的发达引起了对宗教经典的大量需求,同一部佛经往往要被抄录成千上万卷。人们迫切地要求供应大量复本佛经,而传统的传抄方法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佛教的大量传播在客观上对印刷术的产生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捶拓和制造印章的技术是印刷术的先导,而佛教正是依靠印章技术进行宗教宣传的。在今天可以见到的唐文物中有许多“千佛像”,就是在一张纸上重复印上一排排小佛像,它们形状相同,是刻成一个印模而在纸上多次印成的。这种模印“小佛像”标志着由印章至雕版的过渡形态,也可以认为是版画的起源。从现存实物看,有些唐代印的佛像旁边或下面还刻了佛名或刻上一段佛经,形成了图文结合的佛像图片了。这种技术正是印刷术发明的前提条件之一。由此可见,印刷术的产生与佛教的传播、佛经的大量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2、佛经文献早期印品在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佛经文献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其重要作用及地位在印刷史上是其它类型文献无法替代的。

从我国早期印刷品的内容来看,佛经数量较多,这也是当时为了宣传教义、进行传播的需要。佛教充分利用了新生的雕印技术,从民间到官府都大量刊刻佛教经典,以适应社会需要,促进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从质量上看,我国古代早期印刷品中,质量高的珍品也多为佛经文献。1990年发现的敦煌遗书中,佛教经典就占总量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它包括从公元四世纪到十世纪的数以万计的各种经卷,其中许多珍品都在中国乃至世界印刷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如咸通九年的《金刚经》(现藏大英博物馆)就是早期印刷品中的上品,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刻印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这件珍贵的印刷品,在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史上,在版画雕印发展史上,在书籍雕印格式及插图形式上,都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此外,1941年发现的一部元末顺帝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及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的三幅彩印的《南无释迦牟尼佛》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套版印刷实物之一。据考证,其印刷时间为辽统和年间(983—1012),它对我国套版印刷史的研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

3、佛经文献的对外交流推动了印刷术传播。我国的印刷术发明不久,就传播到国外,最先传入的是朝鲜、日本、越南等邻国,继而西传伊朗,并影响了埃及和欧洲。印刷术东渐和南传主要是佛教传播需要。从在朝鲜、日本和越南考古发现的早期文献实物来看,也大多是佛经。据考证,其印刷技术均是中国传入。如1966年在南朝鲜庆州佛国寺发现的《大陀罗尼经》便是雕版印刷术传入朝鲜的有力证明,这是现知年代最早的印刷品,一般认为,这卷经文是在704年由弥陀仙在唐代长安所译,印成后于751年以前带到朝鲜作为建造佛国寺落成时的一件纪念品。^[15]日本的印本书保存至今的是卷子本在日本宝龟元年完成的(770)《百万陀罗尼经》,^[15]从时间上看可以断定,这部经书的雕印技术是日本遣唐使和我国唐代扬州高僧鉴真传给日本的。此外,越南在我国宋朝时也曾多次向中国求过释藏。

因此,美国的印刷史研究专家L·C·Goodrich认为:“所有这一切仍然说明中国是最早开始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印刷术是从那里传播到四面八方的,而佛教是主要传播媒介之一。”由此可见,佛教是我国印刷术向世界传播的主要媒介之一,而佛经文献在印刷术外传中,起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杨曾文. 共书佛教“黄金纽带”的新篇章——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随笔录[J]. 《日本研究》. 1997(3).
- [2] 孟雪梅 田丽君. 论佛经文献在我国图书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1996(2): 47-49.
- [3] 林正秋. 南宋杭州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0(2).
- [4] 靳艳 桑耶寺. 吐蕃道与中印佛教文化交流[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4): 122-125.
- [5] 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室兰州大学图书馆合编. 敦煌学文选(上)[J].
- [6] 顾宏义. 宋朝与高丽佛教文化交流述略[J].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3): 32-37.
- [7] 韩仲民. 中国书籍编纂史稿[M].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88年.
- [8] 来新夏等著. 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
- [9] 吴枫. 中国古典文献学[M]. 1982年.
- [10] 郑如斯 肖东发著. 中国书史[M].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年.
- [11] 肖东发. 中国编辑出版史,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年.
- [12] 彭斐章等. 目录学[M].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6年.
- [13] 张言梦. 元代来华高丽僧人考述[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1999(4): 36-42.
- [14] 李致忠. 历代刻书考述[M]. 巴蜀书社. 1990年.
- [15] 钱存训. 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M].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年.

Buddhist Scripture Document and Ancient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

MENG Xue-mei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Histor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Buddhist scripture document is believed to be an important part in China's historical culture. It holds a unique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Firstly,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ion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nheritance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and foreign nations; Secondly, the demands for the Buddhist scripture document promoted Chinese and foreign Buddhism communications. With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monks, Buddhist scripture was introduced abroad; Thirdly, the large amount of copies and inscriptions of Buddhist scripture provided evid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books system evaluation, document edition and catalogue patents in ancient China, which dramatically developed ancient Chinese books course; Finally, the great demands for Buddhist scripture home and abroad also led to the invention and wide-use of printing, thus the Buddhist scripture and printing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Key words: Buddhist scripture document; cultural exchange; books course.